

关于日本大学汉语教育的思考

张 筱 平

要 旨

日中国交正常化からすでに30年が経過したが、この30年間に、日本の大学における中国語教育もまた大きな発展を遂げた。しかし、教育効果の面からみて、今後さらに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と思われる問題が存在するのも事実である。本稿は、それら幾つかの問題について、現状を分析し、今後に向けての提言を試みるものである。

まず第1に、日本の大学における中国語教育には、バランスを欠いた現象が存在している。中国語そのものに関する研究に比べて、中国語教育に関する理論研究は、いまだ十分に注目されているとは言えない。これは教学の質のさらなる向上を難しくしている重要な原因であり、日本の実情、特徴に合致した中国語教育の大綱を早急に制定すべきである。第2に、授業時間の少なさに比して、相対的に学習内容が多いという矛盾である。この矛盾を解決するには当然、もともと十分とは言えない学習内容をさらに削ることは出来ないので、新たな方法を構築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第3は、ヒアリング教育の問題である。これは日本の大学の中国語教育における弱点である。ヒアリング教育に対する認識を強化し、学習上の重点を「聴き、話す」方向へ転換させ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る。

第4に、日本人の学生の一般的特徴を考えたとき、中国語教員が教育の質的向上を目指すならば、学生の学習における積極性を促すよう配慮する必要がある。学生の積極性を発揮させるには、中国語文化の特徴と

日中言語文化間の特殊な関係を考慮することが望まれる。

本稿では以上の問題に対し考察と提言を試みたが、中国語教育関係者がこれらの諸問題に関心を持ち、相互に研鑽する契機となれば幸甚である。

なお本稿は、愛知大学共同研究助成（A-11）による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り、今泉潤太郎教授、安部悟助教授を中心とする研究グループの成果に基づき執筆したものである。本稿の主要な内容、観点については、両先生から貴重なお教示を賜った。ここに記して謝意を表します。

目次

- 一. 問題の提出
- 二. 关于汉语教育理论建设的问题
- 三. 关于教学时间少与教学内容多的矛盾
- 四. 关于听力教学问题
- 五. 关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问题
- 六. 结束语

一. 問題の提出

近些年，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日趋活跃和日中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关系的发展，日本国内大学的汉语教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继文部省确定汉语为高考外语语种之后，高中开办汉语课程的越来越多，大学里的汉语教育也“水涨船高”，参加日本的“中国语能力检定试验”和中国的“汉语水平考试”的大学考生人数不断攀升，汉语言文化的学术著作、工具书、教材等也不断翻新，空前繁荣。

但是，日本国内大学的汉语教育，从教学效果来看，还存在着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许多学生在经过一年或两年的学习之后，仍然听不懂简单的生活用语，开口表达的能力也很低；学生在结束汉语专门教育之后，接触实际时往往出现严重的不适应症，所学内容在实践中难以运用，与中国人发生交际障碍和交际冲突的现象极为普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汉语的听、说、读、写等技能的获得很不平衡，听、说技能的获得程度普遍较低；学生参加日本的“中国语能力检定试验”和中国的“汉语水平考试”所获得的等级普遍大大低于所学过课程的教学目标；经过一段汉语教育之后到中国去留学，许多学生都会感到进入同等级

水平的班级学习十分吃力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否与日本大学的汉语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呢？或者说，日本大学的汉语教育是否存在着问题呢？如果存在问题，又是怎样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于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对目前日本国内大学的汉语教育进行了一番研究，并对某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做了一些思考，在此提出，希望能与同行们共同探讨。

二. 关于汉语教育理论建设的问题

在研究中，我们在搜集资料、调查的基础上，将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现状与日本大学的汉语教育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毋庸讳言，因为占有绝对的语言环境优势，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水平自然大大高于日本。但是，决定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水平的，除了语言环境优势之外，还有无其它因素呢？回答也是肯定的。首先，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在走过的半个世纪的历史行程中，一直在不停地探索研究汉语教育理论问题，并且已经逐渐地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汉语教育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在初步形成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初步形成的今天，对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比较起来，日本大学的汉语教育界在走过的几十年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许多比较好的教育传统。但是在科研方面，日本大学的汉语教育界，似乎更为重视汉语本体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值得骄傲的丰硕成果，而对于汉语教育理论的研究，则显得十分冷清。这是个难以回避的矛盾，因为任何外国语的研究都是以指导提高教育水平为其终极目标的，而要指导提高外语教育水平就要在科研上靠两条腿走路，一是靠语言本体研究（即研究“教什么”），二是靠语言教育理论研究（即研究“怎么教”），二者发展不可失衡。显然，日本大学的汉语教育界在教育理论的研究上存在着不足，这种不足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呢？这是个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般地讲，语言教育理论研究从横、纵两方面都分成两类：从横的方面看，可分成“教”的理论研究和“学”的理论研究；从纵的方面看，可分成“宏观”理论研究和“微观”理论研究。各种理论研究都来源于教学实践，又对教学实践产生指导、规范、促进、提高等作用。中国对外汉语教育理论的建设，在经过教育经验总结式的摸索阶段之后，近一、二十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对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产生的作用可以说越来越显著。对此，日本的汉语教育界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恰恰相反，而是给予了热切的关注。那么，具有吸收和改造外国优秀文化的民族性格的日本同行们，为什么不直接引进中国同行们的研究成果呢？中日两国的汉语教育具有共同的特点和规律，从这一视角看问题，引进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理论成果肯定存在着可行因素。事实上，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日本的大学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很多都参照、运用了中国同行的教育理论成果，但大多都零星地取之于“教”的“微观”理论层面，无法铺展，不成系统。之所以如此，原因很明显，中日两国的

汉语教育既有共同的特点和规律，又各自具有特殊性。这一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是在目的语环境下把汉语当作外国语进行的教育，教学对象主要是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而日本大学的汉语教育所面对的，不仅是教育对象、语言环境与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不同，而且教育体制、师资队伍、社会环境、教育科研机制等也存在着很大区别。因此，直接引进，或者说照搬中国同行们的教育理论成果，特别是那些宏观性质的教育理论成果，是很不现实的。摆在日本大学汉语教育界面前的问题是，搞好汉语教育理论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但关键不在于直接引进，而在于改造和创新。然而，日本汉语教育界又如何“改造”和“创新”，探索出一条自己的汉语教育理论建设之路呢？这也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汉语教育理论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工程项目非常广泛。比如“学习”层面的学习策略、学习风格、学习的情感因素、学习背景、母语迁移、学习动机、学习需求、学习方式、学习目标等；“教育”层面的，如教育心理、教育策略、教育风格、教育情感、教育原则、方法、技巧、教学实践、课堂教学、技能训练、教材、教学评价、教学大纲等。搞好这样一个大范围的系统工程建设，有的需要单兵或小集体作战，有的则需要一定范围的大集体通力合作。前者表现的是个人或小集体的意志和观点，尽管可以取得一定范围的认同，但没有代表相当范围的意志和观念的必然要求。后者则不同，大集体的概念并不是指研究人员的众多，而是指研究项目本身必须反映相当范围的客观真实和思想理念，研究过程必须得到相当范围的支持与合作。纵观日本大学的汉语教育理论的研究，对于前者形式的成果，虽说不如汉语言本体研究领域那么丰硕，但毕竟还是有所收获的，但对于后者形式的研究，则不能不说还处于有待开发的阶段。这是很值得学者们给予重视的一个问题。

在庞大的语言教育理论系统工程里，大集体作战和单兵或小集体作战的课题项目相比，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全局性的语言教学运作中，其功能性和影响力却至关重要，其中最典型的就教学大纲。众所周知，教学大纲是语言教学理论的灵魂，对语言教学的等级划分、教学目标、教学范围和内容、课程设置、课时要求、教材建设、考试等，都具有宏观统领、调控、规范、指导的作用。一个具体的语言教学大纲应当包括教学等级标准、教学时间设定、教学基本原则和要求、基本课程设置、语音大纲、文字大纲、词汇大纲、语法大纲、功能大纲、情景大纲、考试大纲等。语言教学大纲是受目的语水平评价体系制约的，在相同的目的语水平评价体系制约下，各个教学单位都各自制订自己的教学大纲是很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的教学大纲，比较成熟的是北京语言大学杨寄洲先生主编的版本，其次，一些其它具有雄厚师资力量的一定规模影响力的著名学府，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等，也都有自己的内部版本。据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目前正在组织全国各地专家编写一部具有相当权威性的综合版本。这些教学大纲从酝酿、调查、研究到编写、试用、磨合，对教学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日本大学汉语教育的思考

日本大学的汉语教育走过了几十年的路程，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部比较完整成熟的汉语教学大纲，相比之下，倒是高中的汉语教育在这一点上走到了大学的前面。平成11年（1999年），“全国高等学校汉语教育研究会”组织研制出一部《高校汉语教育のめやす》。该著分“文法编”（即“语法大纲”）和“语汇编”（即“词汇大纲”）两大部分，共收语法（以例句计算）166项，词语718个，虽说还显得粗糙、稚嫩，不尽完美，但毕竟是个开创，成为日本高中汉语教育，也是全日本汉语教育的第一部教学大纲，对统一和规范日本高中的汉语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日本大学的汉语教育由于没有教学大纲，其基本状况是教学单位各自为政。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这种各自为政，虽说对于形成自己的教育风格、教育特色起到了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但造成整个汉语教育局面上的混杂无章，直接影响到汉语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其负面的消极作用也是明显的。比如——

1. 怎样区分教育类型？非正式教育（如短期教育、长期培训）与正式教育，以及正式教育的第二外语、第一外语、专业外语的类型之间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教育类型在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教学要求等方面怎样体现区别？

2. 汉字、词汇、语法等应该怎样定位、定量、划分教学等级？听、说、读、写四大技能的教学等级标准是什么？各个教学等级与汉语水平评价体系的等级关系是怎样的？

3. 教学时间基准怎样设定？设定的科学根据是什么？

4. 课程应该怎样设置？设置的科学依据是什么？

5. 教材应该怎样编写、选用？编写、选用教材根据怎样的教学等级标准和教学法思想？由于对这些问题，缺少统一的认识，便产生了下列普遍现象——

1. 不同类型的教育可以选用相同或相似的教材，教学内容和要求也没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区别；

2. 某些字、词、语法的项目在应当出现的等级教学中没有出现，而在不应当出现的等级教学中却出现，或在不同的等级教学中反复出现；

3. 除去期末复习、考试的时间，教学时间量偏少，而教学内容量偏多，构成极大矛盾。教师要完成教学内容，必然要舍弃很多课堂训练，影响教学效果；而要扎扎实实地进行课堂训练，提高教学效果，结果往往是减少教学内容。

4. 课程设置，以第一外语教育为例，一般只有口语和阅读两种。正式教育类型的课程，从整体上看，阅读课多于口语课，或者说，阅读课比较受重视，学生接受听说训练的机会较少。

5. 汉语教材每年都编写出版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数量之多，恐怕在国际汉语教育界也很少见。教材中，中级、高级课本很少，原因有二，一是学生少，需求量不大，二是字、词、语法项目的起始点和终点、语料的范围、教学标准等无从掌握，因而不好编写。占绝大多

数的是初级课本，这些初级课本，由于是O起点，编写起来较为容易些，但由于没有字、词、语法、功能、情景等大纲的限定，语言内容的量和等级的划分、顺序的排列等等，十分杂乱。另外，因为考虑到流通量小，出版成本高，为了不增加学生经济负担，大多数教材采用了压缩手段，其结果必然是挤压练习部分，造成练习形式单调，量小，使用时需要教师重新设计，教师和学生都要附加大量的二次劳动。同时，大量的课本都以编者和编者的教学单位的实际情况为着眼点，没有从全国整体着眼编写的依据，因而雷同现象严重，重复劳动过多。

当然，除了上述情况外，没有教学大纲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还可以例举很多，但仅此已经足以说明，研究编写适合日本大学实际的汉语教学大纲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研制确立日本大学的汉语教学大纲，决非一两个学校一两名教师就能做到的，必须要在一定的组织下集中各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在反复调查研究和反复试验的基础上进行。在这一点上，日本高中的汉语教学大纲的研制出台，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三. 关于教学时间少与教学内容多的矛盾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又不可回避，必须要谈。如果我们将日本大学汉语或者相关专业一年级的情况和中国对外汉语专业的情况进行一下量化比较分析，这一问题的存在会显得更为清晰。

首先，从教学时间上看——

	周数	周时数	总课时数
中国 (以《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为准)	33以上(不包括复习、考试)	30以内	800—990
日本	26	2—4(相当于中国的4—8)	52—104(相当于中国的104—208)

其次，从教学内容上看——

	词汇量	语法量
中国 (以《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为准)	3051个	252项
日本	(以每周50个计): 1300个	(以每周5项计): 130项

《汉语水平等级标准》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研制的，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水平评价的主要依据。如果也将其作为日本汉语教学的参照依据，其词汇和语法的周分配率是——

关于日本大学汉语教育的思考

	每周平均词汇量	每周平均语法量
中国 (33周)	93.45	7.63
日本 (26周)	117.35	9.65

事实上,中国的大学一年级的学习周数,很少有33周的,一般都在36—40左右。如果以36周来计算,中国大学一年级每周所学的平均词汇量则是84.75,语法量则是7。

如此比较,可以看出,日本大学汉语教育的教学内容量大和教学时间量小的矛盾是非常严重的。如果说,中国的《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不适合日本的实际情况,不能作为日本大学汉语教育的依据,那么,把日本汉语教学内容的大约一学年1300个词汇量和130项语法量作为标准,平均到课时中去,其内容量大和时间量小的矛盾仍然很突出。请看——

	每课时平均词汇量	每课时平均语法量
中国 (词汇3051个、语法252项、课时900)	3.39	0.28
日本 (词汇1300个、语法130项、课时相当中国的208)	6.25	0.625

显然,即使如此,日本大学的等量时间单位的教学内容仍然是中国的2倍左右。同等条件下,语言教学的效率与教学时间量是成正比的,没有相当的时间保障,教学效率很难保证。更何况,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与日本大学汉语教育相比,又占有目的语言环境的优势呢?日本大学生在经过一年或两年的汉语正式教育之后,汉语水平普遍不能达标,其原因恐怕与教学内容量与时间量之间比例失调密切相关。长期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日本大学汉语教育界,因此,解决这一矛盾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值得认真思考,研究,找出解忧的办法。

当然,解决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增加教学课时量,因为毕竟,教学内容量与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相比,已经减少了二分之一左右,这在国际汉语教育界本来已经很低了,再减少教学内容量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增加教学课时量又会与目前日本的教育体制发生冲突,在不牵涉教育体制改革的情况下也很难实施。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在目前的条件下必须寻找其他途径。比如:

1. 实施TT教师辅助教学制。TT教师是指从国外聘请的外国语辅助教学人员,他们的职责是,尽可能多地接触学生,创造一个小型的目的语言环境,针对主讲课程中的教学内容组织学生进行训练,加以消化,解决主讲课程在课堂上没有时间处理的疑难问题,同时进一步扩展学生的目的语言文化知识面。这种辅助教学制,实际上是一种隐性教学,它普遍适应日本学生的学习心理,不但可以使主讲课程的教学时间得到有效的延伸,而且可以充分挖掘学生课下学习的潜能,丰富学生课下的学习生活。当然,最主要的是可以使学生有效的巩固主讲课程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提高语言交际能力。TT教师辅助教学制究竟始于

何时何处，我们无从考察，其实也没有必要考察，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种教学制的时空渊源，而在于是否适用于汉语教育，实施效果究竟如何。据我们调查，日本大学有些英语专业实施了这种辅助教学之后，很受学生欢迎，教学效果明显提高。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在经过慎重的论证之后，也采用实施了这一教学制，结果同样证明了它的实践价值和科学价值。

2. 充分利用电化教学手段。如果说，日本大学的汉语教育和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相比较，不具有目的语言环境的优势，但在办学条件上，电化教学设施的先进和完善程度还是占有相当优势的。电化教学的高效率功能是不言而喻的，研究和开发电化教学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在大学汉语教育采用的电化教学手段一直是录音，出版和采用的教材也大多带有录音磁带或录音CD光盘。固然，利用录音进行外国语教学具有不可替代的功效，今后还会发展下去。但是，在进入计算机时代的今天，更加立体、形象、高速度、超时空的智能化的计算机教学手段则功效更高，更具有开掘发展的广阔前景。近几年来，日本有些大学注意到了这一点，研制出部分带有自动评价功能的课本练习软件。这是个可喜的进步。日本大学的师生，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一般都具有使用计算机的条件。在有限的主讲课程教学时间里无法完成的各种训练，教师完全可以通过高智能的计算机学习软件来组织学生完成。但目前我们所开发出的汉语计算机学习软件还很有限，如果我们的汉语教育专家和计算机专家联手来，把我们今后的主讲课程教材全面推向计算机化，甚至在具备教学大纲的条件下，系统地研制出各种带有自动翻译功能、自动调速功能、自动评价功能的语音学习软件、词汇学习软件、语法学习软件、会话学习软件、阅读学习软件、听力学习软件、写作学习软件、影视作品学习软件、汉语考试题库等等，那么，我们的教学时间必然可以在时空灵活的计算机学习软件的利用中得到有效的延伸，教学质量毫无疑问也会大幅度提高。

3. 增加自由选修课程，把隐性教学转换成显性教学。这里所说的隐性教学，是指主讲教师在研究室对来访学生的个别辅导。一般说来，敢于利用教师的时间，积极找教师请教学习问题、用目的语面对面谈话的学生，其学习成绩往往较好。日本大学教师都有自己的研究室，上班时间，除了上课，教师一般都在研究室里工作。为了提高教学水平，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学生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到教师研究室向教师请教。这种“规定”的好处自不必说，但有两个缺陷：一是日本学生大多数胆子比较小，比较腼腆，对教师的敬畏心理重，不敢主动地去找老师的麻烦，而敢于去找老师的总是少数，这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似乎不太公平；二是敢于来找教师请教的学生，所请教的学习问题和谈话的内容有很多相似或重复，这对于教师来说，无疑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因此，如果把这种隐性的教学公开化，增设一些主讲教师的辅导课，让学生自由选修，这样，教师就可以把学生在主讲课程中遇到的教学难点，有计划地集中安排到辅导课上去帮助学生进一步地理解

关于日本大学汉语教育的思考

和巩固,既解决了教师在不同的时间面对不同的学生重复相同教学内容所造成的浪费问题,又解决了许多腼腆的学生想得到老师的指教而又不给老师添麻烦的心理难题,对于师生双方都有好处。当然,即使这样做,教师的研究室还是要对学生开放的,比较自由的辅导课的增加,显然无形中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但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大大缓解教学上的时少量多的矛盾,有效地促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充分消化吸收。

4. 合情合理地利用学生的课下时间。日本国内就读的大学生,课下时间比在中国留学的大学生要多得多。从中国留学归国的日本大学生普遍感叹国内许多大学生的课下时间过于轻松,原因恐怕与国内许多大学生有太多的课下时间却不能充分利用相关。日本大学生不仅平时上课时间比中国大学生少,而且年间休长假的时间要比中国大学生多,中国大学一学年的长假大约占全年时间的25%到30%,而日本大学一学年的长假几乎占了全年时间的50%。这么多的课下时间,除了必要的休息之外,日本大学生一般都将其三分开,一是用来打工,二是用来锻炼身体、交际、娱乐,三是用来学习。至于学生怎样分配这三部分课下时间,自然根据个人具体情况而定,教师不便干预。但是,日本学生大都具有依赖教师的心理,教师指导学生利用课下时间学习,一般来说,对学生在安排课下时间方面产生的心理作用还是很大的。日本的大学教育,任何一门专业课程,放弃对学生课下时间的利用,仅凭有限的课堂教学是很难完成的,有着教学时间少和教学内容多的突出矛盾的汉语教育更是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教师应该怎样利用学生的课下时间?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可以经过研究,独立成文甚至是专著。我们在这里只能把问题提出来和同行们共同思考,因为毫无疑问,合情合理地利用学生的课下时间是有效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日本大学生们都懂得应该利用课下时间学习的道理,但又都不愿意自己的课下时间过多地被学习占用,很多人都要靠打工来赚取生活费用,而且把大学期间看作是人生交际、娱乐的重要阶段,因此必须使用相当数量的完整时间才能完成程式枯燥的语言课下作业的传统做法,常常会使他们感到为难,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如果教师在利用学生课下时间时,忽视学生这种实际存在的心理,显然不会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但是,如果教师根据客观实际,引导学生把相当的课下学习和个人的生活习惯、业余工作、爱好、体育活动、人际交往、娱乐等有趣地结合起来,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规定学生每天利用早晨起床后、晚上睡觉前或者出门途中背熟指定的两三个具有典型语法结构意义的句子,并且能解释清楚什么情况下能使用,怎样替换、扩展;让学生运用学过的语言知识把打工、体育活动、娱乐等有关情况写出来,说出来;让学生把自己在报纸上、电视里遇到的相同类型的句子找出来,翻译成汉语;让学生观看中国的电视小品、电视剧、电影等,找出学过的句式;设定一个主题或几个问题或几个句式,让学生用汉语面对面接触或采用电话、电脑的方式和中国人交谈等等。办法和技巧千变万化、多种多样,这种形式的利用学生课下时间,相信比起那种千篇一律的固定格式的语言作业形式会更受学生欢迎,效果也会更明显一些。

四. 关于听力教学问题

学习汉语的日本大学生，汉语的听力水平普遍较低，我们以1999年11月中国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在日本西部地区实施的初中等级的考试结果作为参照，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一现象。此次参考学生平均成绩是250分，其中语法平均62分，阅读理解平均77分，填空平均61分，而听力理解平均仅50分，与单项平均分数最高的阅读理解竟然相差了27分！爱知大学的86名在籍学生当时也参加了该次考试，结果各项技能平均分数的构成与整个西部考生的情况基本相同，听力理解与阅读理解的平均成绩差也是27分。由于爱知大学考生的情况很有代表性，我们把当时爱知大学考生的各项成绩分布又作了进一步的统计，结果很令人吃惊。请看——

	40分以下	40～59分	60～79分	80～100分
听力理解	51%	31%	16%	2%
阅读理解	11%	27%	41%	21%
语 法	18%	42%	29%	11%
填 空	10%	49%	34%	7%

很明显，听力理解能力之低，与阅读理解能力之高构成了极大的反差。这很能说明日本大学生学习汉语的现实状况。

同样是语言信息的输入与解码，日本大学生的汉语听力与阅读能力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反差现象呢？经过调查研究，我们认为除了语言环境因素之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母语的正负迁移作用，二是教学思想方法的作用。日语作为无声的书面语言，其主要物质外壳儿与汉语一样，都是汉字，尽管经过长时间历史的冲刷，两国汉字在形和义的层面上都有了一些变化，但仍然保持着基本的血缘色彩。这就为日本学生解读汉语文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与此相反，日语作为有声的口头语言，其物质外壳语音与汉语的差别很大，由于日语的音位比汉语少，汉语里许多具有区别意义的发音用日语很难区分，再加上日语汉字的音读与中国现代汉字的读音有一定的联系，这就使得日本学生在输入和解读汉语有声语言材料时常常受到母语的干扰。从另一个角度看，日本外国语教育界，历来重视书面语言教学与研究，对有声语言教学和研究存在着认识与实践的严重不足。这种传统的外国语教学思想方法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是造成学习汉语的日本大学生听力理解能力低下最根本的原因。

语言交际分有声语言的口头交际和无声语言的书面交际两大类，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使得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人际交往越来越频繁，有声语言的口头交际也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1999年9月，日本文部省根据未来国际社会对外语人才的要求，颁布了特别修订的《中学校外国语学习指导要领》（也就是“中学英语教学大纲”），

关于日本大学汉语教育的思考

该“要领”修订的突出特色是，进一步强调了外语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实际的语言交际能力，并把有声语言的口头交际能力的培养确定为教育重点。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外语教育改革，虽说只是在中学范围，但其主要精神对于日本大学的外语教育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日本大学的外语教育，特别是汉语教育，是否也应该把有声的口头交际能力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重点呢？这个问题很值得认真思考。

毫无疑问，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与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目的和未来就业的需求等等相联系的。学习汉语的日本大学生听力水平低下，口头交际能力自然也就很低，这种现象的形成，据我们了解并不是因为学生普遍没有获得汉语口头交际能力的实际要求。事实上正好相反。再加上，日语母语对学生学习汉语在听说和读写两个方面上造成的完全相反的正负迁移作用，也就是在听说学习方面的正迁移作用小，负迁移作用大，而在读写学习方面上的正迁移作用大，负迁移作用小，这就更有必要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日本大学汉语教育重点应该怎样定位的问题了。

我们认为，日本大学的汉语教育的重点应该向培养学生有声的汉语交际能力这一方向转移。因为学生在大学学习汉语一般都处于初、中级阶段，而这一阶段的汉语学习，听说能力的培养比读写能力的培养，难度要大得多，要搞好汉语听说课程的教学，事实上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这一点，相信很多汉语教师都会有切身的体会。把教育重点向教学的难点转移是很自然的，只有实现这样的教育重点转移才有可能改变学生听说能力与读写能力反差过大的现状，适应学生的普遍学习需求。

培养学生有声汉语的交际能力，自然首先要加强听力教学。儿童习得母语和成人学习外语不同，但也有共性。“听”是输入语言信息，“说”是输出语言信息；先输入，后输出；输入大于输出；输入多于输出；输入第一，输出第二。从这些人类习得母语和学习外语的共同客观规律，可见“听力”的重要。从另一个角度看，听力的本质是人们利用听觉器官对有声言语信号的接收与解码，成人在学习外语时，头脑中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母语的音义结合的信号系统，要想达到正确地接受和解码外语有声信号，就必须逐渐地摆脱对母语的依赖，不断排除母语系统的干扰，建立起一套新的目的语信号系统。而在建立目的语信号系统的过程中，听力教学与训练起着不可替代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听力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特殊性，中国对外汉语教育界很早就注意到了，早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开始设置听力技能型课程，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课程建设逐步成熟，课程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这恐怕也是在中国留学的日本大学生汉语口头交际能力普遍提高较快的重要原因。

日本大学汉语教育听力教学很薄弱，这一点毋庸置疑。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既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上文中提及的教学时间少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有成效的听力教学需要对学生进行大运动量的训练，耗时量实在太多。教育体制在课程时间上的严格规定，

很难使教授们将听力技能型课程独立设置起来。因此，在思考加强听力教学这一环节的办法时，寻找独立设置课程以外的途径是比较客观实际的。比如：①在现有课程内部，把听力教学作为一个固定的项目，安排一定的时间组织进行。②教材编写要考虑到听力教学的需要，增加和丰富听力训练所需的内容和练习。③课下给学生布置一定量的听力作业，加强听力作业的检查监督。④和计算机专家联手研制高智能的听力练习电脑软件，利用和发挥电化教学的高效能作用。⑤单独设计听力考试，明确和加强学习评价中的听力比重。⑥灵活地利用学生的课外时间，让学生在轻松的气氛中接触一些汉语视听材料，由浅及深，由易及难，逐步增强学生的汉语语感。当然，要在不设听力课的前提下加强汉语听力教学，办法肯定不止这些。如果重视起来，认真研究，不断的探索实践，相信日本大学汉语教育中的听力教学一定会取得明显成效的。

五. 关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问题

任何第二语言的教育质量都与学习者学习的积极性密切相关，作为成人的大学生，能否在大学学习期间成功地获得一定水平的第二语言，除去能力和智力等因素之外，最主要的恐怕就是学习的积极态度了。学生是否具备学习的积极态度，固然在于学生自己本人，也就是在于学生本人是否具有产生足够学习积极态度的内驱动力，比如对目的语言及其国家民族文化感兴趣、喜欢、好奇，未来工作、生活非常需要目的语言文化能力，喜欢教授目的语言的教师或使用目的语言的朋友，喜欢目的语言的教育氛围、方式方法，甚或仅仅为了争强好胜，要取得好成绩等等。但是，学生学习的内驱动力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通过教育者的外驱动作用而被激活、形成的，因此学生的学习态度是否积极，教师的工作也是非常关键的。日本大学的第二语言教育尤其如此。

对于汉语教育来说，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让学生初步地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表面上看来，这似乎与汉语教育没什么关系，而事实上关系非常重大。中国和日本虽说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交流史，但由于近代世界列强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原因，使许多日本青年对近在咫尺的中国远不如对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了解得多。心理学认为情感和欲望是以了解为基础的，没有对中国一定程度的真实了解，怎么可能对中国语言文化生发出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呢？与英语教师相比，日本大学的许多汉语教师要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去帮助初学汉语的学生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原因恐怕正在于此。汉语是打开中华文化宝库的钥匙，是日中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工具。如果让选择学习汉语的学生能够简单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地理、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宗教、民族、民俗、科学技术、工艺美术、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等，让他们知道将来所面对的是怎样的文化宝库，

关于日本大学汉语教育的思考

在21世纪全球化发展的大潮中，日中两国有着怎样的发展前景，这样就非常有可能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动机，进而产生学习兴趣。

用了解真实的中国来调动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除了教师直接向学生教授有关中国的知识以外，最好的办法还是借助日中两国一衣带水的地理优势和在日华人数量多的优势，组织安排学生直接接触中国和中国入。爱知大学除了每年向中国姊妹大学派遣长期留学生之外，还定期组织学生到中国短期留学、教学实践、考察、调查研究和在国内访谈中国留学生等等，事实证明，这些活动不但提高了学生的汉语水平，而且最重要的是收获了学习汉语的热情。

当然，对于教师，保护和调动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主要还是体现在主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日本大学生的民族个性非常明显，许多人，课下朋友相聚欢声笑语生龙活虎，课上面对老师拘谨小心寡言少语；不少人自尊心很强，自信心很弱，害怕出头，害怕犯错，害怕被人耻笑，因而宁可选择沉默也不愿意开口表达；有些人愿意接受被动式的训练，不愿意接受主动性的训练；有的人愿意做书写性的练习，不愿意作口头性的练习；有的人不喜欢课堂上的评价检查，为躲避评价检查要么迟到，要么缺席；甚至有人干脆课上人在心不在，课下书本不动，考试前临阵磨磨枪，考试后，明知学分难得还要硬着头皮请求老师高抬贵手走马放曹等等。不可否认，个别日本学生选择学习汉语只是为了投机取巧混个学分，因而其学习积极性很难激发，但即便如此也没有教师肯轻易放弃对其学习的关心和保护。

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调动，与其他语言专业教师对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调动是有共同性的，比如，师生关系和谐；教材、语料科学实用；尊重学生自尊；注意教学方法等等。这些都是原则层面的东西。汉语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调动上还应该有自己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是由汉语言文化的特点和日中语言文化的特殊关系决定的。比如，怎样消除学生畏惧教师的心理，“严师高徒”、“良师益友”、“情同父子”等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观念怎样统一和谐在现代人的师生关系观念中？怎样消除学生学习汉语的畏惧心理，让学生正确认识日语体系对于学习汉语的正负迁移作用，扬长避短，少走一些弯路？对于学生在学习中所犯的汉语错误，哪些是必须纠正的，哪些是暂缓纠正的，哪些是可以不予纠正的，不同的错误又怎样区别对待分别处理？怎样使学生在愉快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面对汉语言文化的特点和日中两国语言文化的特殊关系，编写怎样的教材，选择怎样的语料，采用怎样的教学方法、教学技巧更为学生喜欢，更具有趣味性和吸引力？等等。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东西。据我们了解，日本大学汉语教育界，许多教师对于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都具有很高的认识，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果将这些认识和经验汇集整理升级为理论成果，相信会具有非常高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对日本大学汉语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势必产生积极的影响。

六. 结束语

关于日本大学汉语教育，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研究范围之广之深，很难在一两篇论文中论述清楚。本文斗胆将此问题提出，只是想抛砖引玉，引起同行大家的关注，并给予深入的讨论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 《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部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
2. 《语言教学原理》 盛炎著 重庆出版社1996年6月版
3. 《对外汉语初级阶段教学大纲》 杨寄洲主编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4. 《汉语听力说话教学法》 杨惠元著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版
5. 《高校中国語教育のめやす》（日本）全国高校中国語教育研究会編集、発行 1999年6月
6. 《中学校学習指導要領解説—外国語編—》（日本）文部省 東京書籍株式会社平成11年10月1日発行